

改革开放初期海峡两岸学界 围绕民国史编纂的对话^{*}

武 晓 兵

40 多年来，海峡两岸史学界经过不断地接触、交流与切磋，并共享彼岸丰富的档案文献与学术成果，相互砥砺、取长补短，已然取得巨大成绩。然而，回顾改革开放初期，两岸关系总体上仍处于对立状态，但由于中国大陆开放国策以及中美建交的双重催动，大陆积极改变对台策略，使得两岸关系有所缓和。基于这样的时空背景，两岸近代史学界曾有过一段关于民国史研究的学术争论。1979 年，中国大陆编纂《中华民国史》的信息传到台湾，立即引发岛内各界一阵震动，并由此造成两岸近代史学界围绕这一问题的隔空对话。虽然隔空对话充斥着比较强烈的意识形态味道，却也并非完全消极。学术竞争的心理为两岸史家 1982 年在美国芝加哥辛亥革命讨论会上的首次接触提供了助力，与会两岸学者就辛亥革命性质及意义问题展开了争论与交锋。对此，学界既有的研究多是在民国史或台湾史学的研究回顾中予以提及，并未从两岸对话与竞争的角度展开讨论，更未论及这一隔空对话对两岸史学界首次境外接触的推动意义^①。本文即尝试从以上角度对此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番细致的梳理，呈现改革开放初期海峡两岸史学交流的发端情况。

一、中国大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缘起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前政权“中华民国”在大陆主流史学叙事中已然成为过去。易代修史的传统史学思想，即从历史资源中获取当下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执政者和史学工作者。1949 年之际的政权更替虽非传统意义上的王朝更替，但传统思想中的“正统”观念依旧影响着国家教育文化政策以及思想学术研究。李新在《我们是怎么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一文中就说“中国历代修史都非常重视所谓正统，争这个正统。争正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争合法统治的权利。所以他们编的历史，都是有明确的立场的。什么是真正的正统呢？我们认为创造历史的是人民，真正的正统应该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正统。”^②正是基于这种正统思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编写《中华民国史》就成为不同时期国家科学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学术任务。

这项兼具学术与政治意义的《中华民国史》编纂工程，曾在 1956 年、1961 年、1971 年三度被提出，前两次均因稍后的政治环境变化影响而未能付诸实践，直到 1971 年政治环境出现短暂宽松，

* 本文是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改革开放初期海峡两岸史学接触研究（1979—1987）”（SK2021A0307）的阶段成果。

① 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如章开沅等主编《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235 页；张海鹏《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几个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陈红民《“民国史观”与中华民国史新学科体系的构建》，《民国档案》2011 年第 1 期；王戎笙《台湾地区史学》，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年，第 617—621 页；许冠三《三十五年（1950—1985）来的台湾史界变迁》，《新史学九十年》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45 页；桑兵《两岸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交流的回顾与展望》，《广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

② 李新《我们是怎么编写〈中华民国史〉的》，《史学月刊》1982 年第 4 期。

在“制定全国出版计划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才又把这项工作提出来。当时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标点二十四史。周恩来总理说：二十四史要标点；清史稿也应该标点；并且还要编写民国史……中华民国史被列入了全国出版计划”^①。这项编纂工作的重新上马或与当时国际局势以及中美关系开始缓和有关。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探路”。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在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耿云志所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势必牵扯到台湾问题。1949年以后，台湾仍以中国的合法政权自居。大陆提出为中华民国修史，意味着向世界严正表明：中华民国已成历史，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权。”^②此外，如果从学术意义上来考量，民国史研究在当时仍处空白“待垦”状态，而且当时社会对此认识也基本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高校里没设置这门课，书店里也比较缺乏这类书，“当然身历‘民国’的老人，总知道或多或少的一些民国史上的掌故。但是如果要求从历史的规律性上阐明一些问题，比如对毛主席就民国史上一些问题所作的高度概括与论断，用丰富而可靠的事实与数据加以阐明的话，那我们在好多方面感到‘力有未逮’”^③。

1972年秋，这一学术任务由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担，并由时任该所副所长的李新全权负责。李新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主持编写高等院校教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李新为谨慎起见，曾以近代史所名义呈报告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党组书记刘西尧、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其中指出“在当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由近代史所负责这项任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④近代史所也为此成立相应学术建制“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为“室”），李新兼任组长，正式开展这项工作。

根据他们拟定的计划，最后要完成的整个民国史的成果，主要有3部资料集以及1部《中华民国史》。3部资料集为《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和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专题资料。在以上资料积累的基础上，编成《中华民国史》3编6卷，第1编为“中华民国的创立”（1卷，1905—1912），第2编为“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2卷，1912—1928），第3编为“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3卷，1927—1949）。^⑤在体裁结构上，主编者采取学术近代化以来的章节体，但这套著作仍不免留有传统正史体例之“纪”“传”“表”“志”的痕迹。整套民国史编写既体现了李新“先把有关史实弄清楚、弄准确，以避免出现‘硬伤’或流于徒发空论的要求，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史学著作的编写传统”。“《中华民国史》是主体，类似正史中的‘纪’。《人物志》在体裁上就是‘列传’。《大事记》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表’的作用。缺少的是‘志’，《专题资料》原来设想在这方面起些补充作用，但没有做完”。^⑥这也基本印证了传统正史对后世学者的影响。

拟定体裁之后，在以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为近现代史学主流叙事的学术时代，民国史的内容应该写些什么才能与革命史有所区别？这是他们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经过编委会的一番讨论，他们认为“革命史直接写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它直接写劳动人民的斗争，直接写出人民群众是如何创造历史的。也就是写奴隶们创造历史而不是英雄创造历史。民国史虽然写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民族资本主义，写统治阶级这方面的历史，但同样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因为这是一个问

① 李新《我们是怎样编写〈中华民国史〉的》，《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

② 转引自王洪波、郭倩《38年的民国40年的“民国史”》，《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26日。

③ 孙思白《关于编写〈中华民国史〉工作的进展情况与问题》，《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3期。

④ 韩信夫《由“险学”到“显学”——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陈启能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史学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4页。

⑤ 李新《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简介》，《历史教学》1979年第2期。

⑥ 金冲及《纪念李新同志》，《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9期。

题的两个方面。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也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失败。直接写人民群众的斗争，固然是反映了人民创造历史。从另一方面，写统治阶级怎样没落，怎样走向灭亡，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只有把两方面都写出来，这段历史才更加丰富。”^①

这段研究民国史的反向思维的诠释与定位，在“左”倾思想盛行的年代显得极有智慧与勇气。正如有论者指出：“李新、孙思白等民国史研究的先驱者们筚路蓝缕，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与学术勇气，对民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研究对象、编纂方法等，确立了基本原则与方向，为后来的学者们一直沿用至今。”^② 前辈学者明确提出以民国统治阶级为民国史的研究对象，“打破了以往统治阶级只作为革命史的陪衬的局限”，同时也丰富和拓宽了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③。这一仍具时代印迹的民国史研究体系，不仅开拓了民国史学科，也为后来的民国史著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本。经过此后30余年的发展，民国史已然成为一门繁荣的学科。不过，由于民国史内容与近代史、革命史、中共党史等学科交叉、叠合，其研究范畴及体系问题仍旧是困扰当前相关研究者的重要问题之一，当然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④

民国史研究室自1973年起，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刊载民国史文献史料，截至1980年末，共计出版《人物传》23辑，《大事记》31辑，还有特刊、增刊、专刊、专题资料等29种36册、译稿19种43册^⑤。其中，1978年出版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是“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的第一本民国人物传记集”^⑥。1980年，《民国人物传》第2卷出版。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1卷《中华民国的创立》出版，标志着民国史学科在中国大陆的正式建立。^⑦ 此后，在两三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之下，整套民国史包括《中华民国史》12卷、《人物传》12卷、《大事记》12卷，总计36卷，于2011年由中华书局出齐，在中国大陆民国史学术研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台湾对大陆编写民国史之因应

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在科技、文化、学术等领域掀起交流的热潮。同年4月16日，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由宦乡和宋一平担任正副团长，以费孝通、钱锺书、李新、芮沐、薛葆鼎、赵复三、廖秋忠等该院各学科重要学者为成员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其间，李新于5月12日在斯坦福大学讲演，谈到大陆编纂民国史的具体计划及进展情况。当月30日，台北《联合报》即登载一则吴相湘教授介绍大陆民国史编纂情况的讯息。这是目前所见台湾对大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最早报道，报道称：中共正在编写《中华民国史》，据了解，初稿叫作《中华民国史稿丛稿》，一共23本，已有6本付印。这些《丛稿》，目前只在中共内部流传。吴相湘呼吁“中华民国”朝野注意这件事。“中华民国”的史料，绝大部分保存在台湾，“国史馆”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应协同历史学者，编纂一套真正的中华民国史料，以防中共歪曲史实。^⑧

这个消息引发台湾岛内一阵声讨与批驳，在震惊之余，相关人士开始呼吁有关当局尽快开放档

① 李新《我们怎样编写〈中华民国史〉的》，《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

② 罗敏《民国史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③ 王建朗《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④ 参见曾景忠《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汪朝光《民国政治史研究》，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71—72页；陈红民《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地区的民国史研究》，《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

⑤ 王洪波、郭倩《38年的民国40年的“民国史”》，《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26日。

⑥ 李新、孙思白等主编《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前言”第1页。

⑦ 参见张宪文《民国史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张海鹏《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几个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汪朝光《50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⑧ 《竟然编印中华民国史》，《联合报》1979年5月30日。按：这份报道在个别史实上存在错误，如所说的《中华民国史稿丛稿》，应该是《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案史料，撰写中华民国史，以与大陆对抗。6月1日，“中研院”近史所张玉法即在《联合报》发表《加强民国史研究刻不容缓》一文，他直言看到此消息后感到“惊惧交集”，“惊的是中共竟如是重视中华民国的历史，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把中华民国初期几十年的历史，不厌其详地编纂起来”；“惧的是，中华民国的史料，大部藏在台湾，中共没有完整的史料，如何能编写一部像样的历史？如果完全歪曲史实，公正的史家日后要费多少年的工夫才能澄清？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他对大陆撰写民国史持猜疑与否定的态度。“惊惧”之后，他以过去大陆学术出版品“完全依照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来写”的经验认知批判大陆编纂民国史的动机，认为其无非是“想借此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而已”，即使编纂出版也“不可能有什么学术价值”。虽然对此极尽批驳与否定，他仍提醒台湾史学界要“正视”此事，认为这套著作如果大量发行到世界各地，“对一般人的迷惑仍是相当大的”。他还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台湾在民国史研究上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远远不够，“民国史的研究虽然不算是在沙漠中播种，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太肥沃的土壤”。他进而提出应该在三个方面继续加强民国史研究：一是大量开放史料，供中外学者研究利用；二是合理利用各个研究机构的优势，合作推进研究；三是鼓励学术性研究，建立坚实的“国史”。台湾史家应尽快动员人力、物力撰写民国史。^①当然，这不仅仅是张玉法个人的认识，可以说整个台湾史学界当时的反应皆如此。在初晓这一消息时，他们大都感到“震惊与关切”^②。随着讨论的深入，他们在因应策略上主要集中于批驳大陆修史和如何建设台湾民国史两个方面。

在台湾素有“野史馆”之誉的《传记文学》杂志，有感于岛内社会舆论对民国史编纂的关注热度逐渐降温，^③在1979年底召开“民国史研究座谈会”，借此继续呼吁台湾近代史学者重视大陆修史以及就如何撰写台湾之中华民国史提出设想与建议。这次座谈会邀请李璜、沈云龙、蒋永敬、张玉法、李云汉等学者参加，他们在会上发表个人看法，认为大陆修史活动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且是“别有用心”地否定现实“中华民国”的存在，即使得以完成也非“信史”，只能是“秽史”。^④他们对大陆民国史研究的学术价值给予贬低，坚持认为台湾史学界尽快组织力量撰修民国史与大陆抗争，已是刻不容缓之事^⑤。

在所有的批评文章中，以时任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秦孝仪的《对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一文最为大陆学者重视^⑥。1980年8月15日，秦孝仪借“中研院”主办“国际汉学会议”之机，在会上宣读该文，大肆批评大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史学研究和编写《中华民国史》的动机及用意。他认为，1949年以来的大陆史学皆以“历史为政治服务”为目标，“把历史当作注释马列主义教条及毛泽东思想的工具；把历史当作为它的政权作合理解释或为它的行为作历史性掩护的工具；也把历史当作它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他批评大陆30年来“改写”中国历史以符合唯物史观之五种社会形态完全是“扭曲史实”、为唯物史观作注解。对于大陆编写《中华民国史》的学术活动，他更贬斥为“中共改写中国历史处心积虑的一贯作业”，并就动机与取向方面历数七大意见：第一，“企图透过编写《中华民国史》来夸张马列主义理论以及毛泽东思想”；第二，“企图透过对史实的扭曲，把它的政权推上历史的‘正统’”；第三，“采用中国人历来纂修‘断代史’的惯例心态，阴谋通过修史的手法，来暗示结束‘中华民国’的历史”；第四，“突出共产党在这段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五，“肯定孙中山先生的地位，不再确认孙中山先生对中国革

① 张玉法《加强民国史研究刻不容缓》，《联合报》1979年6月1日。

② 《“民国史研究座谈会”开场白》，《传记文学》第35卷第6期（1979年12月）。

③ 《“民国史研究座谈会”开场白》，《传记文学》第35卷第6期（1979年12月）。

④ 参见李璜《官方修史与私家修史应该齐头并进》、沈云龙《我对纂修中华民国史的看法》，《传记文学》第35卷第6期（1979年12月）。

⑤ 参见沈云龙《我对纂修中华民国史的看法》、蒋永敬《撰写中华民国史应进入实行阶段》，《传记文学》第35卷第6期（1979年12月）。

⑥ 孙思白《谈〈民国史〉编写问题·寄语台湾同行诸君》，《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命所作的贡献，而在依附之以为夺取革命领导权的口实”；第六，“以反共与否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第七，“歪曲历史，为中共制造不实的事象”。最后则全面否定大陆在1949年以后的思想学术，甚至认为“中共只不过是把历史当作一种工具、一种幻术罢了，历史独立的尊严业已荡然无存”。^①秦孝仪主持的“党史会”曾在内部座谈会上多次就大陆史学和修民国史问题展开批驳，基本观点与秦文如出一辙^②。这些观点已非客观理性的学术讨论，更多是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情感发泄。

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考虑如何建设民国史的具体问题。以前述《传记文学》举办的“民国史研究座谈会”为例，与会学者在批评之外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修史、采用何种方式修史的问题上，如选择官修、私修还是官私合修。他们基本认为，官私合修是较为合适的组织形式。他们抱着“迎头赶上”的心态给台湾当局及学界同仁提出几项建议：其一，在台湾“十大建设”之外，增设一亿元“民国史研究建设”专项经费；其二，设立“民国史研究基金”，鼓励和奖助近现代史学者的课题研究和著作出版；其三，设置“民国史研究出版委员会”，由“行政院”直接统领，并网罗百位以上有成就的史学家从事有计划之研究工作；其四，集中或合并史料及图书馆机构的珍藏，制定全台湾范围的“统一联合目录”，为学者提供便利。^③这些建议虽略显书生意气，但也能看出他们对于追赶大陆民国史研究的决心。当然，其中也不能排除他们利用这种学术竞争的契机，推动台湾当局上层为民国史研究开放史料、提供经费等方面支持的意图。

通过座谈会的形式讨论民国史研究的现状及未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成为台湾近代史学者应对大陆修史的一种常态。譬如，1980年8月14日，台湾中央月刊社又组织以“我们对编纂中华民国史的观点”为主题的学术座谈会，邀请黄季陆、秦孝仪、吕实强分别报告“国史馆”“党史会”和“中研院”近史所在中华民国史资料整理以及专题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和未来规划，参加者有李国祁、陈捷先、张朋园、张玉法、曾祥铎、洪茂雄、王洪钧等。座谈会主要有以下几种论调：第一，不必过于重视大陆编纂《中华民国史》的宣传活动；第二，“国史馆”“党史会”和“中研院”近史所近年来在民国史研究上作出很大成绩，修史乃千秋大业，不必因大陆修史而受影响；第三，台湾民国史史料整理与研究已具有一定规模，逐渐进入收获阶段；第四，台湾“教育部”规划集中力量编纂《中华民国建国史》具有重要价值，以后可以此为基础由“国史馆”等史政机关整合力量制定更加完整的民国史编纂计划；第五，当前社会对史料机关未开放史料的批评有欠公平，但其统一运作制度与立法方面存在缺陷则属事实。^④

除以组织座谈会表达意见之外，台湾史学界因应之策中最具声势也最具代表性的活动与成果，应属1981年召开的“中华民国建国史”学术讨论会和台湾“教育部”主编的耗时十余年完成的《中华民国建国史》多卷本。

1981年7月15日，秦孝仪在《党史委员会重要工作报告》中强调了“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召开的目的、筹备情形、会议规模、会议内容以及具体程序。关于召开之目的，秦孝仪认为，近年来国际史学界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已经蔚成风气，陆续有知名学者及后起之秀不远千里而来，要求研阅史料，或是提出问题请求剖析。同时，大陆要编写《中华民国史》、举行“辛亥革命七十年纪念讨论会”等“统战活动”。台湾方面面对着国际学术界的学风和大陆的“统战阴谋”，审慎研讨“制敌机先”的对策，当前所应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要能积极因应学者研

① 秦孝仪《对中共编写〈中华民国史〉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出席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宣读之论文》，《近代中国》第18期（1980年8月）。

② 参见刘本炎整理《中共篡改历史问题之研究——中央党史会研究员副研究员座谈会纪实》，《近代中国》第17期（1980年6月）。

③ 《“民国史研究座谈会”开场白》，《传记文学》第35卷第6期（1979年12月）。

④ 《我们对编纂中华民国史的观点》，《中央月刊》第12卷第11期（1980年9月）。

究需要，把握时机，举办一次中国现代史的学术会议，扩大我们对于国际史学界的影响和促进国际史学界对于我们的认识。同时也借此让他们较多接触到我们这一方面的史料和学人及其研究成果，相信这对多年来在国际间由于“歪曲宣传”而制造出来的对于我们的许多误解和偏见，会逐渐产生纠正澄清的作用。^①

1981年8月23日至28日，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在台北召开。遵循台湾民国史主流叙事模式，会议设置五个分组：辛亥革命史组（1894—1912）、开国护法史组（1912—1926）、北伐统一及训政建设史组（1926—1937）、抗战建国史组（1937—1945）、复国建国史组（1945—）。在正式召开时，第五分组改为“中兴建设史组”。会后出版《中华民国建国史论文集》六册，前五册是会议论文集，附录一册收录会议组织程序文件、会议期间相关新闻报道、学者专访与座谈评述、会议专题报道，其核心内容基本上在肯定此次会议对于台湾学术甚至政治的重大意义，包括使台湾在“国际”上的影响更加提升，同时严厉批驳中共“扭曲历史”“篡改历史”，把大陆编纂《中华民国史》、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举都视为“披上了学术外衣”的“统战伎俩”。^②

在台湾社会舆论的呼声之下，又因“立委”李志鹏的质询^③，“行政院”指示“教育部”及其直属单位“国立编译馆”尽快着手编纂一部民国史。“教育部”决定在1980年成立编辑小组，组织百余位近代史学者编纂《中华民国建国史》多卷本。据亲历者回忆，规划这项学术任务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即是应对大陆民国史的编纂。如张玉法在回顾个人学术道路时就说“在我所参加的编书计划中，一个更为严肃的计划是教育部所主持的《中华民国建国史》。此一计划，是四、五年前中共夸言要为中华民国修史所引起。”^④蒋永敬在回忆录中也说，此著“一为史学界的呼唤，一为对抗中共编撰之《中华民国史》，而后一原因，尤为重要”^⑤。在具体的编纂规划中，由“党史会”负责“开国时期”和“抗战时期”，“中研院”近史所负责“民国初期”，“国史馆”负责“北伐统一建国时期”和“戡乱复国时期”。^⑥不过，也有学者对由官方主编民国史表示不满，如台湾大学李守孔认为，百余年的民国史割裂为四段并由四个单位分别负责，势必造成“各写各史”。他提议由“中研院”近史所独立承担，利用丰富馆藏档案“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华民国史》”，如此不仅能够“引起国际重视”，也可以“摧毁中共文化统战之阴谋”。^⑦

台湾《中华民国建国史》经过十余年编修最终全部出版，整套著述共5篇16册——第1篇“革命开国时期”（2册），第2篇“民初时期”（4册），第3篇“统一与建设”（3册），第4篇“抗战建国”（3册），第5篇“戡乱与复国”（4册），相继在1985年、1987年、1989年、1990年、1991年出版。从内容上来看，全书思路基本以孙中山、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统治为主要叙事主线，所采资料丰富翔实、内容庞大细致，如果抛开具体史观不说，确为一部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的重要民国史专著。^⑧但此著在全部出版以后，实际上在学界并未产生太大影响^⑨。

台湾史学界得知大陆编纂民国史消息以后，反应如此之大，其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国

① 秦孝仪《党史委员会重要工作报告》（1981年7月15日），“国史馆”藏，数位典藏号006-010901-00023-006。

② 参见《中华民国建国史论文集》第6册会议报道及评述内容。

③ 沈云龙《我对纂修中华民国史的看法》，《传记文学》第35卷第6期（1979年12月）。

④ 张玉法《走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道路》（下），《中国论坛》第17卷第3期（1983年11月）；参见张玉法《民国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历史讲演集》，东大图书，1991年，第17页。

⑤ 蒋永敬《九五独白：一位民国史学者的自述》，新锐文创，2017年，第138页。

⑥ 《我们对编纂中华民国史的观点》，《中央月刊》第12卷第11期（1980年9月）。

⑦ 参见《短钉鞭祭岂是修民国史之道》（社论），《中国时报》1980年7月24日。

⑧ 茅家琦即指出，这部书资料丰富，吸取多种中文研究成果，但“最大缺陷在于政治倾向性太强”。参见茅家琦《中华民国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从宏观上兼评几部中华民国史通论著作》，《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孙子和《“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简介》，《近代中国》第93期（1993年2月）。

际背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且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有所缓和，并在1979年正式建交。同时，美台“断交”。在国际“外交”上的接连受挫，对台湾政治社会形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统治迎来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大陆修史将“中华民国”视为已经覆灭的历史，这必然会使他们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引起强烈的反应。其二，两岸历史观的差异。中国大陆史学1949年以来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台湾地区民国史学则主要以国民党“正统”史观为主流。二者存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性差异，所得宏观学术结论也必然会产生较大分歧。其三，两岸史学界严重隔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岸学术界没有任何来往。30年来，两岸互相敌视的状态造成学者之间产生严重的陌生与隔膜。中国大陆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文化学术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台湾学术界对大陆及其学术的认知仍停留在过去。

三、孙思白答复与两岸学者的国际交锋

面对台湾学术界的种种反应与非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于1982年将部分重要文字整理汇编成《台、港及外国对民国史研究的反响》一书，作为《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之一种，由中华书局出版。从资料来源及内容上说，这一资料集主要收录台北《传记文学》1979年首次“民国史研究座谈会”编者、李璜、沈云龙、张玉法、蒋永敬、李云汉、梁廷惇等人的发言记录，秦孝仪在“国际汉学会议”宣读的文章以及海外报刊上的一些评论性文章，虽然所收部分内容充斥着情绪化的字眼，但编辑者以留存史料为目的，对资料未作任何删改，以全部原貌展现给读者，同时也供大陆近代史学者参考与了解。^①基于以上所见资料，时任民国史研究室主任的孙思白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发表《谈〈民国史〉编写问题·寄语台湾同行诸君》一文，对台湾近代史学界的认识与偏见予以解释说明。他认为，因两岸相互隔绝几十年所造成的各种猜忌与误解，台湾学者仍然使用“诡计”“阴谋”“幻术”“花样”等词汇来议论和看待我们正在进行的民国史编写工作，不能不遗憾地说是出于主观臆测，当然这种臆测有其历史积累的因素，是可以理解的。接着，他就台湾近代史学界的误解与偏见作了六点具体回应：第一，台湾学者对大陆编纂民国史的“种种疑虑”完全是不必要的，这项工作实际上仅仅是一件“正常的学术工作”。第二，台湾学者把此项学术工程看作传统之“设官修史”，显然是“误解”。第三，台湾学者同仁皆以为大陆撰史乃是“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发动巨大的人力进行的一项有政治策略意义和目的的工作”，则是“更大的误解”。第四，台湾学者对大陆撰史皆遵循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颇为“非难”，他则坚持认为，“史学工作者，不能没有自己的历史观和与之相应的基本方法”，我们遵循历史唯物主义，“正如台湾同行们也有自己信奉的史观和遵守的方法一样”，在这一问题上“尽可以各行其是，谁也无法勉强谁”。第五，台湾学者对大陆将民国史下限止于1949年“最生反感”，以为“我们意图暗示‘结束’台湾境内的‘中华民国’的历史”。他解释说“国民党政权1949年从大陆撤退后，继续在台湾一省执行它的统治权以至于今，这诚然是事实；但在全国大陆范围内建立了自辛亥以来从未有过的统一的中国新政权，这也是铁的事实。”所以，为尊重客观历史实际，《中华民国史》的下限止于1949年“是无可非议的”。而对于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历史，也不能“强纳入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历史中来”，或可以继续编写《中华民国史续编》单独叙述。第六，他希望在时机成熟之时，海峡两岸学者能够互相交流、开放史料，携手合作，共同书写民国史。^②

孙思白以上六点解释，台湾学者见到之后依然采取不信任和批判的态度，认为其是“统战”的

^① 此书出版不久，即有学者对其介绍与发论。参见金思实《台湾对我编写、出版〈中华民国史〉的反响》，《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03期（1983年3月20日）；周振刚《中华民国史研究及其在海内外反映》，《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

^② 孙思白《谈〈民国史〉编写问题·寄语台湾同行诸君》，《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花招”。沈云龙从旅美友人处得到孙思白回应文章影印件后，于1984年发表《海峡那一边的新花招》一文，认为孙思白的六点说明，前三点是“惯于做作的‘表态’，极见‘巧言令色’的能事”，第四、五点是“强词夺理的‘坚持’，充分证明中共的‘本性难移’”，最后一点更是“‘临去秋波’的‘统战’，在‘三通’之外的又‘一通’的花招”。^①可见，大陆学者的回应并未得到台湾学者的认可，他们仍旧延续此前的态度。

这种对民国史诠释权的竞争状态还延续至国际学术会议上。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两岸及日、美等各国都举办了不同规模与主题的研讨会。与中国大陆友好之日本“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②主办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东京国际学术讨论会”，即于当年10月21日至23日举行，该协会会长兼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有泽广巳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此会“号召台湾海峡两岸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学者都以个人资格参加会议”。^③其中，大陆学者胡绳、陈锡祺、金冲及、李宗一、章开沅等受邀赴会；台湾学者蒋永敬、陈鹏仁、陈三井、李国祁、李守孔等原定参会，但因某些原因，他们临时宣布取消与会。至于台湾学者为何突然取消赴会，章开沅推测可能是“因为叶剑英委员长刚发表过有关祖国统一的九条，他们害怕被误会为响应统一号召，所以避而不与大陆学者接触”^④。这一推测不无道理，主要因素还是在政治上，如台湾学者李国祁当时就说，他们认为“学术会议最重要的意义是学术的独立性与其尊严，如一个学术会议其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势必丧失其学术价值，自无参加之意义”^⑤。而蒋永敬在会后更直接言明是认为此会会被左派学者“操纵”，“发现情况不大适当”，故临时取消，并决定参加另一场在横滨举行的纪念会议^⑥。

10月28日至29日，日本学者在孙中山长期寄寓之地——横滨举行“三民主义与中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研讨会”。这次会议举行的时间仅与“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东京国际学术讨论会”相隔一周。中国台湾学者李国祁、王曾才、李守孔、蒋永敬、朱坚章、李云汉、陈三井等人出席。有意思的是，该会主办单位为日本“日华文化协会”，与台湾政学两界关系密切，有学者甚至将之视为日本的“台湾帮”组织。^⑦而且，参与此会的日本学者也多为与台湾友好之学者。如李云汉指出：“日本方面出席人员有木内信胤、宇野精一、桑园寿二、酒井忠夫等二十余人，多为对中华民国友好学者。”^⑧此次会议主题定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意在阐释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理论，也有与台湾之大陆政策“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相呼应之意^⑨。

对两岸近代史学界而言，日本东京辛亥革命纪念会的价值，在于日本学者试图借此契机使中国两岸学者能够达成首次接触之目的，但是原定赴会的五位台湾学者临时取消行程，致使这一目标未能实现。不过，这一目的最终在1982年4月的美国芝加哥亚洲研究学会第34届年会上得以达成。这次会议经由旅美学者谢文孙居中联络与沟通邀请，促成海峡两岸各派五位重量级学者参加，大陆方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领队，李宗一、李泽厚、赵复三、章开沅为成员；台湾方由中国

① 沈云龙《海峡那一边的新花招》，《传记文学》第44卷第2期（1984年2月）。

② 日本“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成立于1979年9月，“是日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加强同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而组织起来的学术团体。由121名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权威和骨干作为发起人。其主要活动为进行日中两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文献资料的交换，举行两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讲演会、报告会和研究会等”。参见高书全等主编《日本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21页。

③ 章开沅等主编《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第435—436页。

④ 章开沅《我与辛亥革命史研究》，《鸿爪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21页。

⑤ 李国祁《出席横滨“三民主义与中国”学术讨论会纪实》，《近代中国》第26期（1981年12月）。

⑥ 《如何开展国际间研究中山先生学说暨先总统蒋公事功运动》，《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11辑（1984年8月）。

⑦ 郭玉聪《美国、日本华侨华人“反独促统”的对策研究》，《侨务课题研究论文集（2004—2005年度）》上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研司，2007年，第408页。

⑧ 李云汉《史学圈里四十年》，东大图书，1996年，第160页。

⑨ 参见李国祁《出席横滨“三民主义与中国”学术讨论会纪实》，《近代中国》第26期（1981年12月）；陈三井《简记横滨“三民主义与中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研讨会”，《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1期（1982年7月）。

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秦孝仪为团长，林明德、李云汉、张玉法、张忠栋为成员。双方在阵容安排上都颇为强大，可见两岸对此会之重视，所以有学者说双方“都是有备而来”。^①会上主要围绕章开沅、张玉法对辛亥革命性质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的不同认知而展开争论，双方争执的焦点根本在于史观差异，更深层次地说是在民国史诠释方面具有意识形态之别。台湾学者在出席横滨“三民主义与中国”研讨会时，即有日本记者就两岸对辛亥革命的定位提问，当时作为代表发言的李国祁表示“辛亥革命无论就参与分子系来自社会各阶层，以及革命的理想在求中国全面的现代化，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诸方面来看，均是全民的革命，其对中国的意义是与法国大革命相同，代表着一个新时代——三民主义时代的来临。”^②如果两岸学者在日本聚首成功，辛亥革命性质及意义问题也势必会成为他们的争论焦点。

两岸近代史学者的首次接触，虽然在历史话语上存在着根本分歧，却并不妨碍这次接触成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面。它无疑开启了两岸学术交流之先河，是“两岸中国学者第一次正式会晤”^③，“对两岸民国史交流具有里程碑意义”^④。两岸学者同堂共话辛亥革命研究的设想是“一项高明的构想”，更是“一项突破性的历史事件”^⑤。后来，有论者甚至认为“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学术范围。它是台湾当局迫于我和平统一方针的强大影响和台湾与海内外中国人要求祖国统一的强烈呼声，探索与我交往渠道的重要信号。”^⑥这次接触虽具一定政治象征意义，但实质上也是“两岸借着学术交流的一次政治试探”^⑦，两岸学者隔绝30多年造成的心理互相猜疑、提防，使得他们之间初始见面的主要基调仍不脱于之前的争胜意识。所以，有很多人都比较关心“谁是讨论会的胜利者”。^⑧

不论就《中华民国史》编纂的隔空对话还是围绕辛亥革命性质的首次正面接触，两岸近代史学者之间的争论与交锋其实远远超出学术范畴，映射出的是各自所处政治社会影响下的意识形态差异。而台湾学者的核心关怀则是“谁代表中国”的问题，这也是那一代学者普遍关注的政治命题。然而，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随着台湾地区宣布“解严”以及“本土化”思潮的迅速蔓延，又经“台独”势力通过体制力量推波助澜，当下台湾不仅呈现出治理失据、社会撕裂之态，曾经作为那一代台湾学者核心关怀的“谁代表中国”问题也逐渐演化为具有强烈认同意识的“统”“独”之争。

(本文作者 淮北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 朱昌裕)

-
- ① 郭相枝 《发展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现代中国》1992年第2期。
 - ② 李国祁 《出席横滨“三民主义与中国”学术讨论会纪实》，《近代中国》第26期（1981年12月）。
 - ③ 章开沅 《实斋笔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106页；章开沅口述，彭剑整理 《章开沅口述自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6页。
 - ④ 章开沅 《春江水暖鸭先知，似曾相识燕归来——两岸民国史研究追忆》，吕芳上主编 《春江水暖：三十年来两岸近代史学交流的回顾与展望（1980s—2010s）》，世界大同文创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21页。
 - ⑤ 李云汉 《史学圈里四十年》，第163页。
 - ⑥ 卢晓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台湾学术交流的历程与发展》，卢晓衡主编 《海峡两岸社科交流参考》，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第4页。
 - ⑦ 桑兵 《两岸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交流的回顾与展望》，《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 ⑧ 张忠栋 《参加辛亥革命讨论会的始末》，《近代中国》第28期（1982年4月）；张玉法 《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不容撼撼——芝加哥辛亥革命讨论会纪略》，《联合报》1982年4月14日。